

会计准则变迁与长期资产减值*

张 然 陆正飞 叶康涛

摘要: 本文研究新旧会计准则变迁对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行为的影响。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并于 2007 年实施的新《资产减值》准则对旧准则允许八项减值准备转回的规定做出了修改, 规定已确认的长期资产减值 2007 年之后不得转回。本文发现, 上市公司在准则颁布以后实施以前, 并没有由于会计准则变迁而集中转回大量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但由于以后将不允许转回, 上市公司对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明显更加谨慎, 数额有所减少。新准则的颁布对亏损公司使用减值准备进行“大清洗”的现象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本文的经验证据证明, 制定与修改会计准则不仅要考虑到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的执行问题, 还要考虑在新旧准则变迁期间, 公司利用新旧准则的差异进行会计操纵的可能性; 而适当的政策监管对准则变迁期间的公司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关键词: 会计准则变迁 长期资产减值 企业行为选择

一、引言

2006 年 2 月 15 日, 财政部颁布了包括 1 项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准则在内的一整套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要求上市公司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其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资产减值》规定当资产的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 应当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并进一步在第十七条规定: (长期) 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而旧会计准则规定: 对八项资产的减值准备都可以进行转回, 转回时, 贷计当期收益。因此, 长期资产减值能否转回的问题是新老会计准则在资产减值会计处理问题上的最大区别。

目前国际上对以前年度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是否允许转回也存在不同的规定: 有的规定允许转回以前年度已确认的资产(不包括商誉)减值损失; 有的规定对以前年度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国际会计准则(IAS36)允许资产减值转回, 但对其做出了谨慎性的规定, 例如必须有明确迹象表明以前年度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不再存在或已减少, 并必须能够估计该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美国财务会计准则不允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SFAS144《长期资产减值与处置会计》规定: 在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后, 资产的账面价值就成为新的成本计量基础, 主体不应在以后期间调整资产的成本, 所以在资产减值恢复时, 如同其他资产增值不确认一样, 不允许转回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尽管我国新的资产减值准则与 IAS36 有许多方面相当接近, 但两者对资产减值损失是否允许转回的问题仍存在实质性差异。与国际会计准则不一致的这一规定主要是从我国企业目前的发展状况出发, 考虑到我国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转回来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 为遏制这种不良现象而采取的一种反制措施。对于利用减值转回操纵利润的政策顾虑也和资产减值方面的实证研究结果不谋而合。作为我国唯一的一篇研究资产减值转回的实证文章, 王建新(2007)通过对 2001~2004 年我国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行为的分析发现, 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并非由于其资产质量的改善与经济因素的好转, 而是出于其盈余管理的动机所致。国外的研究也对资产减值和盈余管理进行了深入探讨。Strong 和 Meyer(1997)的研究发现, 公司管理层运用资产减值与转回操纵利润, 这种现象在管理层变更时更显著, 即在变更时计提大量减值准备, 以便在

*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产权保护导向的会计研究”(项目批准号: 70532002)的支持。感谢 John Jacob 教授、Denton Collins 教授、岳衡教授和朱炜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未来转回时提高业绩。Zucca 和 Campbell (1992) 发现,大多数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司都有平滑盈余的动机。Francis 等 (1996) 的研究表明盈余管理和真实的资产减值都是促使公司做出减值判断的因素。Reidl (2004) 也发现了资产减值和经理层大清洗动机显著相关。综上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盈余管理是影响资产减值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其中,如果资产减值可以转回,由于其较其他会计报表项目在时间和数量上具有更大的可操纵性 (Elliott and Shaw, 1988), 管理层就可以利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使得企业利润在年度之间转移,从而保持企业的年度利润的稳定。而一旦禁止企业转回资产减值,就会使企业在计提资产减值时更加审慎,减少通过资产减值而进行的利润操纵。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基于这些考虑,做出了禁止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规定。

虽然禁止转回资产减值的规定有助于压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制度空间,但由于新会计准则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执行,在此之前,企业仍旧可以转回资产减值,从而增加净利润。对于以前计提了资产减值的公司,如果当初计提减值的目的是进行利润平滑和盈余操纵,为的是提高以后年度的利润,那么这些公司很可能在新准则实施以前突击转回大量的减值准备,否则这些“被隐藏的利润”将再也无法浮出水面。由于资产减值准则修订的目的是减少盈余管理,为了杜绝在准则变更期间企业利用准则变更的空隙集中转回大额的减值准备,或者计提不符合经济实质的较少减值准备,证监会于 2006 年 11 月 29 日发布了《关于做好与新会计准则相关财务会计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并于 2007 年 1 月 17 日发布了《关于证券公司 2006 年年报审计及信息披露有关事宜的通知》,两次重申“不得在 2006 年底突击转回长期资产的减值准备,不得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机会‘一次亏足’,或在前期巨额计提后大额转回,随意调节利润;也不得随意变更计提方法。”在这些通知和规定的重压下,上市公司会不会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和准则变更的空隙,大量转回资产减值?或者由于计提的减值准备将不能转回,企业是否在新准则颁布以后,比以往计提更少的减值准备?本文试图采用实证方法回答这些问题。

本文的贡献在于首次以实证方法研究会计准则变迁过程中新准则正式实施以前对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行为的影响,国外以往的文献多研究在

准则允许范围内,企业出于各种目的,自身会计方法选择的变化及其后果 (Watts and Zimmerman, 1988), 而很少有文章直接研究准则变迁期间由于新旧会计准则的差异而导致的企业的行为不同。唯一一篇研究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变化的文章是 Reidl (2004), 他研究了美国 SFAS121 “长期资产减值会计”实施之后是否减值计提更多的反映了经济因素,他的结论是,实施 SFAS121 以后,长期资产减值计提对经济因素的反映更差。他没有研究准则颁布以后实施以前的公司行为,也没有对准则实施前后企业出于新旧准则差异而实施的盈余管理进行研究。我国这次新会计准则的颁布是继 1993 年会计改革后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计改革,标志着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正式建立。本文以 A 股全部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论证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行为的影响,结论更有说服力。另外,本文对于使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文献是一个重要贡献。很多文献发现,大清洗动机会促使很多亏损公司计提大额减值准备 (Reidl, 2004; Chen et al., 2003; 戴德明等, 2005)。但他们研究的范畴都是在会计准则稳定的一段区间,或准则实施前后,本文研究了在会计准则颁布前和颁布后实施前一段时间资产减值计提行为的改变,因此对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文献是一个贡献。最后,文章的结论对政策制定者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制定与修改会计准则不仅要考虑到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的执行问题,还要考虑在新旧准则变迁期间,公司利用新旧准则的差异进行会计操纵的可能性;而适当的政策监管对准则变迁期间的公司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本文以下部分的内容结构是:第二部分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样本、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第四部分为研究结果;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研究假设

我国 2007 年实施的新会计准则提供了一个研究会计准则变更如何影响管理层行为的环境。Francis 等 (1996) 的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同时影响公司的资产减值行为。由于在资产减值准则中变化最大的是,旧会计准则允许资产减值转回而新会计准则禁止了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有些公司采用盈余管理的手段在以前年度进行了资产减值,目的是提高以后年度的会计利润

的话,那么在 2007 年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前,公司的管理层就会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在 2005、2006 年年报中,大额转回资产减值。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这两年的资产减值转回大量增加。我们的假设 1 为:

H1:由于资产减值准则变更的影响,上市公司在 2005 和 2006 年会集中转回较多的减值准备。

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计提的减值准备以后将不能转回,相对于以前可转回减值准备而言,企业在计提减值准备时可能会更加谨慎。或者在得知减值准备将不能转回以后,企业可能没有转回更多的减值准备,而是计提更少的减值准备。因此假设 2 为:

H2:由于资产减值准则变更的影响,上市公司在 2005 和 2006 年会计计提较少的减值准备。

上市公司在新准则实施前的资产减值过度转回行为可能由于公司的特性而有所不同。如果以前计提了超额的减值准备,在预期到未来不能转回时,上市公司可能会在当期计提较少的减值准备。而且公司进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可能受以前所计提的减值准备的限制(Elliott and Shaw,1988),这是由于资产减值的转回而增加的资产账面金额,不能高于资产以前年度没有确认资产减值损失时的账面金额。我们可以预期,由于以前年度计提了过多或超过经济因素的减值准备的公司,更可能在新准则实施以前计提较少的减值准备或转回更多的减值准备,即:

H3a: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期初拥有较多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司更倾向于在新准则实施前计提较少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H3b: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期初拥有较多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司更倾向于在新准则实施前转回更多的长期资产减值。

三、样本与描述性统计

我们采用 2001 到 2006 年所有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资产减值数据来源于 Wind 资讯数据库,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高管变迁数据来源于 SinoFin 数据库。我们按照以下原则选择样本:(1)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2)排除当年未披露资产减值状况的公司;(3)剔除了个别变量缺失数据的样本。在新会计准则下,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转回是被明

确禁止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两项中的股权性投资并采用成本法计价的计提转回也是不允许的;而其他流动资产的减值准备,如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四项的计提转回在新旧会计准则中都是允许的。由于长期投资中以权益法核算的部分减值准备可以转回,以成本法核算的部分减值准备不允许转回,而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减值准备将两者统一为长期投资,无法明确计算属于不允许转回的部分,因此本文未将长期投资作为研究对象。综合上述讨论,本文将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减值准备与转回作为研究对象。最后的样本为表 1 所示。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时计提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的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大多数。其中每年有 42.10%的公司有转回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有 3.20%的公司有转回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

表 2 呈现了样本期间各年度,以及新会计准则颁布前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情况的对比。可以看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在新准则颁布以后的计提比例都要小于新准则颁布以前的计提比例,其计提比例各减少了 38.87%和 40.45%。两项汇总的减值准备计提也从新准则颁布以前的平均 0.204 下降到 0.135。新准则实施以前的 2006 年,对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更是达到了上市公司计提减值准备以来的最低点。这些结果都和 H2 一致,即不允许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新准则颁布以后,企业会减少对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表 2 同时也列示了新准则颁布前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情况。新准则颁布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转回并没有明显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固定资产减值转回从 0.262 下降到 0.232,而无形资产减值转回从 0.044 下降到 0.036。这和 H1 不一致,

表 1 样本数据分布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合计
样本公司数目	774	1083	1166	1289	1312	1022	6646
固定资产	计提(转回)	578 (218)	810 (465)	862 (529)	915 (566)	926 (570)	4753 (2798)
	未计提(未转回)	196 (556)	273 (618)	304 (637)	374 (723)	386 (742)	1893 (3648)
	计提(转回)比例(%)	74.68 (28.17)	74.79 (42.94)	73.93 (45.37)	70.98 (43.91)	70.58 (43.45)	64.77 (42.10)
无形资产	计提(转回)	128 (17)	176 (40)	167 (42)	169 (32)	170 (53)	912 (213)
	未计提(未转回)	646 (757)	907 (1043)	999 (1124)	1121 (1257)	1142 (1259)	5734 (6433)
	计提(转回)比例(%)	16.41 (2.19)	16.25 (3.69)	14.32 (3.60)	13.11 (2.48)	12.96 (4.04)	9.98 (2.84)

也就是说,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我们没有发现新准则颁布以后企业比以往转回更多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图 1 用折线图展示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及两项汇总的减值准备计提在样本期间各年度的情况。在 2005 和 2006 年,两项计提都分别有显著下降的趋势,而 2006 年下降趋势更加明显。图 2 展示的是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转回在新会计准则

颁布前后的情况。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减值转回在 2005 和 2006 年并没有显著增加。

四、研究设计与实证结果

尽管我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在新准则颁布以后实施以前的年份(2005 年和 2006 年),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较以前年度大幅减少,而其减值准备的转回并没有明显变化,但其它一些因素也会影响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的数额。这些因素包括以前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数额,上市公司的规模,公司是否有达到某种经济目标的动力(是否为扭亏或微利公司),是否有大清洗的倾向(亏损公司),是否存在高管层变更,公司的盈利状况,收入状况,债务资本比率和行业分布情况等,这些因素的存在也可能能够解释表 2 中报告的在 2005、2006 年度长期资产减值计提减少而减值准备转回并没有明显增加的现象。为了正式的检验假设 H1 和 H2,我们设计了以下回归模型:

$$WD_{i,t} = \delta_0 + \delta_1 NAS_{i,t} + \delta_2 WDO_{i,t} + \delta_3 NAS_{i,t} \cdot WDO_{i,t} + \delta_4 Loss_{i,t} + \delta_5 NAS_{i,t} \cdot Loss_{i,t} + \delta_6 NK_{i,t} + \delta_7 NAS_{i,t} \cdot NK_{i,t} + \delta_8 WL_{i,t} + \delta_9 NAS_{i,t} \cdot WL_{i,t} + \delta_{10} CEO_{i,t} + \delta_{11} Size_{i,t} + \delta_{12} Lev_{i,t} + \delta_{13} ROA_{i,t} + \delta_{14} Ind_{i,t} + \epsilon_{i,t} \quad (1)$$

$$Res_{i,t} = \lambda_0 + \lambda_1 NAS_{i,t} + \lambda_2 WDO_{i,t} + \lambda_3 NAS_{i,t} \cdot WDO_{i,t} + \lambda_4 Loss_{i,t} + \lambda_5 NAS_{i,t} \cdot Loss_{i,t} + \lambda_6 NK_{i,t} + \lambda_7 NAS_{i,t} \cdot NK_{i,t} + \lambda_8 WL_{i,t} + \lambda_9 NAS_{i,t} \cdot WL_{i,t} + \lambda_{10} CEO_{i,t} + \lambda_{11} Size_{i,t} + \lambda_{12} Lev_{i,t} + \lambda_{13} ROA_{i,t} + \lambda_{14} Ind_{i,t} + \mu_{i,t} \quad (2)$$

公式(1)和(2)中,因变量 WD 是经过该项资产减值前净额标准化的当年减值准备计提比例,Res 是经过该项资产减值前净额标准化的减值准备转回数额。NAS 为代表新准则是否颁布的哑变量,如果年度位于 2001~2004 年,该变量取值 0,如果是 2005 或 2006 年度,该变量取值 1。WDO 是公司前一年两项减值准备计提经过该项资产减值前净额标准化后的数额。NAS·WDO 是 NAS 和 WDO 的交叉变量。

对等式(1)中 NAS、WDO 和 NAS·WDO 的系数而言,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使公司在 2007 年以后不能再转回以前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上市公司在新准则颁布以后对长期资产减值计提可能更加谨慎,因此计提较少的减值准备(H2),也就是说,NAS 的系数为负($\delta_1 < 0$)。由于以前年度计提较多可能使得当年计提较少,因此 WDO 的系数预计为负($\delta_2 < 0$)。同时,NAS·WDO 的系数应该为负($\delta_3 < 0$),如

表 2 新会计准则颁布前后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及转回情况*

变量	期间	新准则颁布以前年度平均	新准则颁布以后年度平均	新准则颁布前各年度				新准则颁布后各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当年计提比例(%)		0.247	0.151	0.278	0.264	0.22	0.227	0.175	0.127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当年计提比例(%)		0.089	0.053	0.126	0.074	0.077	0.078	0.055	0.051
两项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汇总(%)		0.204	0.135	0.225	0.216	0.18	0.197	0.162	0.109
固定资产减值转回比例(%)		0.262	0.232	0.226	0.312	0.257	0.252	0.218	0.246
无形资产减值转回比例(%)		0.044	0.036	0.025	0.067	0.045	0.04	0.031	0.042
两项减值转回比例汇总(%)		0.221	0.197	0.194	0.256	0.217	0.217	0.188	0.207

注:*文中数据皆以该项资产减值前数值标准化,另外,本文也计算了以年初总资产和减值前总资产标准化的减值准备和转回情况,其显示的趋势和上表相同。



图 1 2001~2006 年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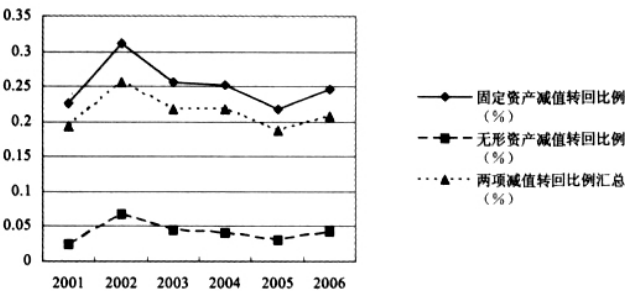


图 2 2001~2006 年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果以前年度通过长期资产减值隐藏了利润,在新准则即将实施的压力下计提较少减值准备的可能性越大(H3a)。

对等式(2)中 NAS、WD0 和 NAS·WD0 的系数而言,上市公司如果在 2005 年和 2006 年大量转回以前通过长期资产减值隐藏的利润(H1),我们的结果会显示 NAS 的系数为正($\beta_1 > 0$)。WD0 的系数应该为正($\beta_2 > 0$),因为如果公司以前年度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较多,就越可能进行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同时,NAS·WD0 的系数应该为正($\beta_3 > 0$),如果以前通过长期资产减值隐藏了利润,在新准则即将实施的压力下转回的可能性越大(H3b)。

Loss 为表示公司是否亏损的哑变量,当公司 i 在 t 年度的净利润小于 0 时取 1,否则为 0。由于亏损公司具有大清洗、调低盈余的动机,我们预计等式(1)中 Loss 的系数为正($\beta_4 > 0$)而等式(2)中 Loss 的系数为负($\beta_4 < 0$)。当公司在亏损年度遭遇会计准则变更时,相对于减值计提而言,由于计提的减值以后将不能转回,这可能会限制亏损公司计提减值准备进行“大清洗”的行为,因而我们预计等式(1)中 NAS·Loss 的系数为负($\beta_5 < 0$)。NK 为表示公司是否处于扭亏年度的哑变量,当公司第 t-1 年度的净利润小于 0 且第 t 年度的净利润大于 0 时取 1,否则为 0。我们预期公司在扭亏年度具有调高盈余,即减少减值准备计提或增加减值转回的动机,因此预计等式(1)中 NK 的系数为负($\beta_6 < 0$),等式(2)中 NK 的系数为正($\beta_6 > 0$)。WL 是表示公司是否为微利公司的哑变量,当公司 i 第 t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处于(0,0.02]时取 1,否则为 0。由于微利公司有避免亏损、调增盈余的动机(Burgstahler and Dichev,1997;Roychowdhury,2006),我们预计等式(1)中 WL 的系数为负($\beta_8 < 0$),等式(2)中 WL 的系数为正($\beta_8 > 0$)。由于 2004 年以后,证监会将“以前年度已经计提各项减值准备的转回”明确界定为“非经常性损益”,并规定不管是 IPO 还是再融资,在计算净资产收益率时,分子是以“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原则确定的。因此,配股动机不会对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行为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没有加入刚刚达到配股要求公司的哑变量。同时,我们加入了经济目标变量(Loss, NK 和 WL)与 NAS 的交乘项来考察新会计准则的推出对使用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和转回达到各经济目标变量的影响。

除了上述主要研究的变量以外,我们还加入了 6 个控制变量来控制其他可能影响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因素。CEO 是公司是否有高管变换的哑变量,当公司 i 第 t 年度更换了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时取 1,否则为 0。当公司高管发生变动时,新任高管一般会通过资产减值减少当期利润,这一方面可以将现在较差的经营业绩推到前任身上,另外一方面也为以后年度增加利润提供了空间(Strong and Meyer,1997;Elliott and Shaw,1988;Francis et al.,1996)。因此,我们预计如果存在高管变更的话,当年对减值准备的计提应该增加,而减值转回应该较少,即在等式(1)中 CEO 的系数为正($\beta_{10} > 0$),等式(2)中 CEO 的系数为负($\beta_{10} < 0$)。Size 是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由于大公司面临较大的政治成本(Watts and Zimmerman,1988;Jones,1991),我们预计大公司应该会计提较多的减值准备,而减值转回较少,即 Size 的系数在等式(1)中为正($\beta_{11} > 0$),在等式(2)中为负($\beta_{11} < 0$)。Lev 为公司的负债资本比率,即负债合计/股东权益合计。由于债务契约的压力,负债更多的公司可能更加倾向于提高公司净利润(Dichev and Skinner,2002),因此我们预计等式(1)中 Lev 的系数为负($\beta_{12} < 0$),等式(2)中 Lev 的系数为正($\beta_{12} > 0$)。ROA 是公司 i 在第 t 年度的资产收益率,Ind 是行业控制变量。

我们从 Wind 资讯和 Sinafin 数据库取得了 2001 年和 2006 年间所有的可以获取到足够数据计算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和每个控制变量的公司年。为消除极值的影响,我们将所有回归(1)和(2)中的连续变量在 1%和 99%的水平上进行极值调整(truncate),即删除变量在前后 1%和 99%以外的取值。这些要求将我们的样本量降低到 5796 个公司年。

表 3 列示了所有回归中的连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PanelA 报告了所有样本连续变量的变量分布,包括标准化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汇总的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公司规模,负债情况,和资产收益率。PanelB 报告了新会计准则颁布以前和以后两个子样本的变量均值以及比较各变量的均值在新会计准则颁布前后是否有显著差异的 Wilcoxon 秩和检验 Z 统计量及 p 值。PanelB 显示,WD 的均值由新准则颁布以前的 0.24 下降到 0.18,下降了 25%,Wilcoxon 秩和检验显示这种差异是显著的($p < 0.001$);Res 的均值在新准则颁布前后仅相差

0.02, 秩和检验的结果说明差异不显著。另外, 新准则颁布以后, 公司的规模和负债率有所上升, 而资产收益率有所下降, 这三者的差异都显著。这些变化也说明了在我们考察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时控制这些变量的必要性。

表 4 是对方程 (1) 的回归结果。我们利用 Newey- West 过程来计算 t 统计量以调整异方差和连续相关性可能造成的影响。在回归 1 中, 当自变量仅包括新会计准则颁布哑变量、上期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这两者的交乘项, 控制变量仅包括规模和行业时, NAS 的系数为负而且显著 ($\beta_1=-0.06, t=-3.50$), 其系数为 -0.06, 表明上市公司由于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而在准则实施前少计提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占这两项资产减值前净额的 0.06%。当我们控制了更多的变量时, 由于新会计准则的颁布而使得上市公司少计提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分别占这两项资产减值前净额的 0.05% ($\beta_1=-0.05, t=-3.41$) 和 0.05% ($\beta_1=-0.05, t=-3.46$)。这些结果支持了假设 2。

WD0 的系数在 3 个回归中都不显著, 这说明上期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对本期没有影响。NAS·WD0 在 3 个回归中也都不显著, 说明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并没有改变上期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对本期计提没有影响的状况。对于 3 个经济目标变量 (Loss, NK 和 WL), 我们发现 Loss 的系数在仅有规模和行业作为控制变量 ($\beta_4=1.16, t=4.25$) 和添加其他控制变量 ($\beta_4=0.86, t=3.60$) 时都显著为正。而 NK 和 WL 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 亏损公司利用计提大量长期资产减值准备来实施“大清洗”, 而扭亏和微利的公司没有利用计提较少的减值准备来实现扭亏或者微利的目的。另

外, NAS 和 Loss 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 在控制规模和行业后, NAS·Loss 的系数为 -0.32 ($t=-1.86$); 在控制更多变量以后, 其系数

表 4 会计准则变更与长期资产减值计提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WD_{i,t} = \delta_0 + \delta_1 NAS_{i,t} + \delta_2 WD0_{i,t} + \delta_3 NAS_{i,t} \cdot WD0_{i,t} + \delta_4 Loss_{i,t} + \delta_5 NAS_{i,t} \cdot Loss_{i,t} + \delta_6 NK_{i,t} + \delta_7 NAS_{i,t} \cdot NK_{i,t} + \delta_8 WL_{i,t} + \delta_9 NAS_{i,t} \cdot WL_{i,t} + \delta_{10} CEO_{i,t} + \delta_{11} Size_{i,t} + \delta_{12} Lev_{i,t} + \delta_{13} Sales_{i,t} + \delta_{14} ROA_{i,t} + \delta_{15} Ind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变量 ^b	预期符合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Constant	N/A	1.37*** (4.72)	0.16 (0.69)	-0.04 (-0.16)
NAS	-	-0.06*** (-3.50)	-0.05*** (-3.41)	-0.05*** (-3.46)
WD0	N/A	0.01 (1.32)	0.01 (0.76)	0.01 (1.51)
NAS×WD0	-	0.01 (0.36)	0.01 (0.16)	0.01 (0.12)
Size	+	-0.05*** (-4.18)	-0.01 (0.16)	0.01 (1.14)
Loss	+		1.16*** (4.25)	0.86*** (3.60)
NAS×Loss	-		-0.32* (-1.86)	-0.32* (-1.90)
NK	-		0.07 (1.11)	0.06 (1.02)
NAS×NK	N/A		0.08 (0.96)	0.09 (1.07)
WL	-		-0.01 (-0.54)	-0.08* (-1.76)
NAS×WL	N/A		-0.04 (-0.91)	-0.05 (-1.16)
CEO	-			0.02 (1.04)
Lev	-			-0.03*** (-3.01)
ROA	N/A			-1.81** (-2.28)
Ind	N/A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5796	5796	5796
Adj. R ²		3.16%	10.84%	11.43%

注:***,** 和 * 分别代表在 1%,5%和 10%水平显著。(a)t 统计量为利用 Newey-West 过程进行异方差和连续相关性调整后计算得到的。(b)WD 是当年减值准备计提占该项资产减值前净额的百分数。NAS 为代表新准则是否颁布的哑变量,如果年度位于 2001-2004 年,该变量取值 0,如果是 2005 或 2006 年度,该变量取值 1。WD0 是公司前一年两项减值准备计提经过该项资产减值前净额标准化后的数额。Loss 为表示公司是否亏损的哑变量,当公司 i 在 t 年度的净利润小于 0 时取 1,否则为 0。NK 为表示公司是否处于扭亏年度的哑变量,当公司第 t-1 年度的净利润小于 0 且第 t 年度的净利润大于 0 时取 1,否则为 0。WL 是表示公司是否为微利公司的哑变量,当公司 i 第 t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处于(0,0.02]时取 1,否则为 0。Size 是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ev 为公司的负债资本比率,即负债合计/股东权益合计。ROA 是公司 i 在第 t 年度的资产收益率。Ind 是行业控制变量。

表 3 变量统计

Panel A: 全部样本的变量分布					
变量 ^a	N ^b	Mean	1 st quartile	Median	3 rd quartile
WD	5796	0.22	0.00	0.01	0.04
Res	5796	0.22	0.00	0.01	0.06
Size	5796	21.17	20.59	21.13	21.75
Lev	5796	1.335	0.571	1.022	1.699
ROA	5796	0.0204	0.0086	0.025	0.0456
Panel B: 在新准则颁布前和颁布后变量的均值及 Wilcoxon 秩和检验					
变量	新会计准则颁布以前 (2001~2004)		新会计准则颁布以后 (2005~2006)		Wilcoxon 秩和检验 Z 统计量 (双尾检验 p 值)
	N	Mean	N	Mean	
WD	3786	0.24	2010	0.18	7.82 (0.001)
Res	3786	0.23	2010	0.21	0.26 (0.792)
Size	3786	21.11	2010	21.27	6.36 (0.001)
Lev	3786	1.252	2010	1.509	9.14 (0.001)
ROA	3786	0.0207	2010	0.0198	2.01 (0.043)

注:(a)WD 是当年减值准备计提占该项资产减值前净额的百分数。Res 是减值准备转回占该项资产减值前净额的百分数。Size 是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ev 为公司的负债资本比率,即负债合计/股东权益合计。ROA 是公司 i 在第 t 年度的资产收益率。(b)样本包括所有从 2001-2006 年从 Wind 资讯和 Sinofin 数据库可以获取足够的数据计算 WD,Res,CEO,Size,Lev,ROA 的公司年。所有连续变量在 1%和 99%的水平上进行极值调整(truncate),即删除变量在前后 1%和 99%以外的取值。

为-0.32($t=-1.90$)。这说明,新会计准则的颁布抑制了亏损公司利用长期资产减值“大清洗”的行为。在新准则颁布以前,

表5 会计准则变更与长期资产减值

转回(括号内为 t 统计量)^a

$$\begin{aligned} Res_{i,t} = & \lambda_0 + \lambda_1 NAS_{i,t} + \lambda_2 WDO_{i,t} + \lambda_3 NAS_{i,t} \cdot WDO_{i,t} \\ & + \lambda_4 Loss_{i,t} + \lambda_5 NAS_{i,t} \cdot Loss_{i,t} + \lambda_6 NK_{i,t} \\ & + \lambda_7 NAS_{i,t} \cdot NK_{i,t} + \lambda_8 WL_{i,t} + \lambda_9 NAS_{i,t} \cdot WL_{i,t} \\ & + \lambda_{10} CEO_{i,t} + \lambda_{11} Size_{i,t} + \lambda_{12} Lev_{i,t} + \lambda_{13} Sales_{i,t} \\ & + \lambda_{14} ROA_{i,t} + \lambda_{15} Ind_{i,t} + \mu_{i,t} \end{aligned} \quad (2)$$

变量 ^b	预期符合	1	2	3
Constant	N/A	1.26*** (4.17)	0.80** (2.65)	1.53*** (3.25)
NAS	+	-0.01 (-0.66)	-0.02 (-0.89)	-0.02 (-0.89)
WDO	+	0.03*** (4.64)	0.02*** (3.27)	0.02*** (3.30)
NAS×WDO	+	0.09** (3.12)	0.08*** (2.91)	0.08*** (2.89)
Size	-	-0.05*** (-3.36)	-0.03** (-2.08)	-0.06*** (-2.79)
Loss	-		0.17 (1.11)	0.09 (0.64)
NAS×Loss	N/A		0.16 (0.68)	0.17 (0.72)
NK	+		0.36*** (3.28)	0.32*** (3.01)
NAS×NK	N/A		-0.03 (-0.18)	-0.03 (-0.17)
WL	+		0.02 (0.32)	0.01 (0.18)
NAS×WL	N/A		0.08 (1.05)	0.09 (1.17)
CEO	+			0.06** (2.39)
Lev	+			0.04*** (2.75)
ROA	N/A			0.97 (1.29)
Ind	N/A			已控制
样本量		5796	5796	5796
Adj. R ²		3.42%	4.99%	7.48%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显著。(a) t 统计量为利用Newey-West过程进行异方差和连续相关性调整后计算得到的。(b) Res 是减值准备转回占该项资产减值前净额的百分数。 NAS 为代表新准则是否颁布的哑变量,如果年度位于2001-2004年,该变量取值0,如果是2005或2006年度,该变量取值1。 WDO 是公司前一年两项减值准备计提经过该项资产减值前净额标准化后的数额。 $Loss$ 为表示公司是否亏损的哑变量,当公司 i 在 t 年度的净利润小于0时取1,否则为0。 NK 为表示公司是否处于扭亏年度的哑变量,当公司第 $t-1$ 年度的净利润小于0且第 t 年度的净利润大于0时取1,否则为0。 WL 是表示公司是否为微利公司的哑变量,当公司 i 第 t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处于(0,0.02]时取1,否则为0。 $Size$ 是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ev 为公司的负债资本比率,即负债合计/股东权益合计。 ROA 是公司 i 在第 t 年度的资产收益率。 Ind 是行业控制变量。

亏损公司比其他公司多计提了0.86%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而新准则颁布以后,亏损公司只比其他公司多计提了0.54%(0.86%-0.32%)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平均降低了37.2%。

在其他的控制变量中, Lev 的系数为负而且显著,这说明债务比例高的公司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更少,这很可能是出于唯恐违反债务契约的考虑。 ROA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资产收益率高的公司计提更少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表5提供了对方程(2)的回归结果。 NAS 的系数在3个回归方程中均不显著。这表明上市公司并没有由于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而在准则实施前更多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这可能与证监会屡次发布通知和公告,一再强调不得在2006年底以前突击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有关。

WDO 的系数在3个回归中都为正且显著,这说明了上年度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越多,本期转回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就越多。 $NAS \cdot WDO$ 的系数在回归1($\beta_3=0.09, t=3.12$),回归2($\beta_3=0.09, t=2.91$)和回归3($\beta_3=0.09, t=2.89$)中,都显著为正;也就是说,虽然平均来说公司没有转回更多的减值准备,但当公司上年度计提了较多减值准备时,在新会计准则颁布使得2007年后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不能转回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会转回较多的减值准备。

对于3个经济目标变量($Loss$, NK 和 WL),我们发现 NK 在回归2($\beta_3=0.36, t=3.28$)和回归3($\beta_3=0.32, t=3.10$)中的系数都显著为正, $Loss$ 和 WL 的系数则不显著。说明扭亏公司转回了较多的减值准备,而亏损公司没有转回较少的减值准备,微利公司也没有通过转回较多减值准备达到盈利的目的。另外, NAS 和3个经济目标变量的交乘项都不显著,也就是说,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动力达到各种经济目标(扭亏、微利)的公司和大清洗的公司相对于准则颁布以前来讲,并没有在新准则颁布后实施前利用更多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达到目的。

在其他的控制变量中, $Size$ 的系数为负而且显著,这符合大公司要负担更多政治成本从而有动力降低盈余的预期。 Lev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负债率高的公司会转回更多的长期资产减值。 CEO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面临高管更换的公司会转回更多的长期资产减值,以提高净利润。

综合表4和表5的结果,可以看出,尽管平均而言上市公司没有突击在新准则实施以前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但是却计提了较少的减值准备,而同样达到了增加利润的目的。表6

表6 剔除新会计准则颁布影响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变量 期间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两项汇总		
	计提比例 变化 (%)	计提比例 变化百分 数(%)	计提比例 变化 (%)	计提比例 变化百分 数(%)	计提比例 变化 (%)	计提比例 变化百分 数(%)	减少的减值准 备可增加公司 净利润(%)
2005	0.072	29.22%	0.034	38.03%	0.043	20.78%	1.27%
2006	0.120	48.63%	0.038	42.54%	0.096	46.70%	2.25%

列示了如果没有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假设上市公司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在以后预期可以转回的话,所计提的减值准备在2005年和2006年各将增加的数额、比例以及由此带来的净利润增加的比例。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上市公司与以往年限一样都认为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在以后年度可以转回的话,假设2005和2006年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为2001~2004年度的平均值,那么2005年和2006年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将分别增加0.072和0.12,这分别是前面四年计提平均数的29.22%和48.63%,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将分别增加0.034和0.038,这分别是前面四年计提平均数的38.03%和42.54%。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减少使得2005和2006年的净利润分别增加1.27%和2.25%。

五、结论与总结

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旧会计准则在资产减值方面做出了重大修改:即新准则将不允许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这一规定是出于某些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进行盈余管理而做出的。本文发现,在新会计准则颁布以后,正式实施以前的2005年和2006年会计年度,上市公司平均而言并没有转回超额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但是对于上年度计提较多减值准备的公司在新的准则颁布的压力下,却在2005年和2006年转回了超额的减值准备。

文章的结果同时也表明,在准则颁布以后,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远小于颁布以前,2005年平均降低了20.78%,而2006年平均降低了46.70%。也就是说,尽管没有巨额转回,但上市公司普遍通过减少计提减值准备提高净利润,这种行为使2005年上市公司净利润平均增加1.27%,2006年上市公司净利润平均增加2.25%。另外,我们的结果还说明,亏损公司的确利用减值准备进行“大清洗”,新准则的颁布对这种现象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这表明,尽管在2005和2006年新会计准则还没有正式实施,但已经给上市公司的行为造成了一定影响。

这篇文章的结果一方面为新会计准则在资产减值方面的规定提供了理论支持,即上市公司的确利用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进行盈余管理,而且新会计准则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一现象;另外一方面也表明,在会计准则制定的过程

中,不仅要考虑到准则实施以后企业各种可能的利润操纵行为,而且还要考虑到在准则颁布以后但正式实施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企业可能最后利用旧准则的机会进行利润操纵。从更广阔的视角上来讲,本文为会计准则制定以及颁布和正式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可能利用会计准则变迁的空隙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实证证据,也为准则制定者考虑在准则变迁期间的企业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者单位:张然、陆正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叶康涛,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责任编辑:尚增健)

注释

由于新会计准则的发布日期是2006年2月15日,大多数公司还没有公布2005年的年报,有机会操纵2005年的资产减值。另外,会计准则在发布之前,很可能也有信息的泄漏,因此,我们将2005年也作为可能大量转回资产减值的年份。我们的敏感性检验表明,2006年2月15日以后发布年报的公司作为颁布后样本结果不会发生改变(仅有46个公司年的2005年年报是在2006年2月15日以前发布的,占颁布后样本的2.29%)。

由于我国从2001年起对长期资产减值才有明确的会计准则规定,因此2001年以前长期资产减值的样本非常稀少。

另外,由于长期股权投资价值受证券市场影响较大,而国内A股市场在2005年和2006年股票指数涨幅巨大,也可能导致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转回异常,基于这些原因,文章未将长期股权投资作为研究对象。

2005年9月1日,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总数是1389家。

表中显示的是各变量在1%和99%的水平上进行极值调整(truncate),即删除变量在前后1%和99%以外的取值后的结果。

我们在敏感性检验中也在回归中加入了年度哑变量以控制经济因素对长期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的影响,其结果和表4、表5类似。

Wilcoxon秩和检验显示,亏损公司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在新会计准则颁布前后都显著高于盈利公司。但其差异在新会计准则颁布后有所减少。

参考文献

- (1) Burgstahler, D. and I. Dichev, 1997, "Earnings Management to Avoid Earnings Decreases and Loss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4 (1), 99-126.
- (2) Chen, C. J., S. Chen, X. Su and Y. Wang, 2004, "Incentives for and Consequences of Initial Voluntary Asset Write-Downs in the Emerging Chinese Marke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Research*, Vol 3, No. 1, 43-61.
- (3) Dichev, I., and D. Skinner, 2002, "Large-sample Evidence on the Debt Covenant Hypothesi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0 (4), 1091-1123.
- (4) Elliott, J. A. and W. H. Shaw, 1988, "Write-offs as Accounting Procedures to Manage Percept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6, 91-119.
- (5) Francis, J., J. D. Hanna and L. Vincent, 1996, "Causes and Effects of Discretionary Asset Write-off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4(Supplement), 91-114.
- (6) Jones, J., 1991, "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9 (2), 193-228.

(下转第139页)

注释

在此指货币资金和短期借款占期末总资产比重的同行业中位数。

②事实上,东盛科技从2001年就是开始出现双高问题,但是当年货币资金占总资产的比重并没有超过同业中位数,为控制行业因素的影响,在此不将2001年计入“双高”期间。

③满足投资支出需要后的现金持有。

④指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下限的总幅度。根据中宏数据库整理的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从1998年11月起,金融机构对小企业贷款利率可在法定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20%,大企业中上浮10%;金融机构贷款最低下浮10%。从1999年9月起,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可在法定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30%,对大型企业贷款最高上浮10%;最低下浮10%。2004年10月29日起,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贷款利率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0.9倍。

⑤杨凯生,“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困境与金融创新”《银行家》2006年第2期。

⑥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经济》上指出,“国家于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通过组建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剥离了四家银行部分不良贷款……四家银行实际剥离不良贷款约为10000亿元”。

⑦1996年12月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控、监测指标和考核办法的通知”规定,对同一借款客户贷款余额与银行资本净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对最大十家客户发放的贷款总额不得超过银行资本净额的50%。该通知于2006年初废止。

⑧为控制异常值的影响,行业平均值采用中位数计算。

⑨上海科技没有在年报中披露短期借款利率的区间,只在2005年报中公开了拖欠贷款的借贷利率。

⑩已据公告对东盛科技的重大会计差错加以调整,但是利息支出仍有可能低估,导致2003~2005年期间的EBIT高估,由于ROA始终在贷款利率区间之下,因此不影响文章的主要结论。

⑪东盛科技披露的部分贷款利率区间超出了央行允许的浮动幅度,公司实际贷款利率范围应小于披露的区间,但是因东盛科技存在高估的息税前ROA在双高期间始终低于央行允许的贷款利率下限,因而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⑫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上海科技在非募集项目上存在大量现金出资方式的股权投资,合并现金流量表的抵消因素“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一项无法全面反映上市公司内部的现金流动情况,特别是关联投资。

⑬上海科技控股及参股子公司具体负债情况未逐年披露。

⑭大股东关联企业。

⑮2007年1月因斯威特集团未按时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义务,无锡市国资委通过仲裁重新取得了小天鹅集团的控股权。

参考文献

(1) Blanchard O. F., Lopes-de-Silanes and A. Shleifer, 1994, “What Do Firms Do with Cash Windfall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36, pp.337~360.

(上接第84页)

(7) Reidl, E. J., 2004, “An Examination of Long-Lived Asset Impairments”,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79, No.3, 823~852.

(8) Roychowdhury, S., 2006,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forthcoming).

(9) Strong, J., and Meyer, J., 1997, “Asset Write-downs: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Security Returns”, *Journal of Finance* (July), 643~661.

(10) Watts, R. L. and J. L., 1986, “Zimmerman, Positive Ac-

(2) Chen, J., 2004, “Determinants of Capital Structure of Chinese-listed Compani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57, pp. 1341~1351.

(3) Diamond, D. W., 1991, “Debt Maturity Structure and Liquidity Risk”,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pp.709~737.

(4) Flannery, M. J., 1986,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Risky Debt Maturity Choice”, *Journal of Finance*, Vol.41, pp.19~37.

(5) Fischer, E., Heinkel, R., Zechner, J., 1989, “Dynamic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Theory and Test”,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44, pp.19~40.

(6) Harris, M., A. Raviv., 1991, “The Theory of Capital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e*, Vol.46, pp.297~355.

(7) Hennessy, C., 2004, “Tobins' Q, Debt Overhang, and Investment”,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LIX, pp.1717~1742.

(8) Leland, H., 1994, “Corporate Debt Value, Bond Covenants, and Optimal Capital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e*, 49, pp.1213~1252.

(9) Leland, H., D. Pyle, 1977, “Informational Asymmetries,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Journal of Finance*, 32.

(10) Morris, J. R., 1976, “On Corporate Debt Maturity Strategies”, *Journal of Finance*, 31, pp.29~37.

(11) Myers, S., 1984, “Capital Structure Puzzle”, *Journal of Finance*, Vol.38, pp.575~592.

(12) Tong, G., Green, J., 2005, “Pecking Order or Trade-off Hypothesis? Evidence on the Capital Structure of Chinese Companies”, *Applied Economics*, Vol. 37, pp.2179~2189.

(13) Zou, H., Xiao, Z., 2006, “The Financing Behavior of Listed Chinese Firms”, *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Vol.38, pp. 239~258.

(14) Zwiebel, J., 1996, “Dynamic Capital Structure under Managerial Entrench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 (5), pp.1197~1215.

(15) 黄少安、张岗:《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16) 陆正飞、叶康涛:《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解析——偏好股权融资就是缘于融资成本低吗?》,《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

(17) 彭桃英、周伟:《中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动因研究》,《会计研究》,2006年第5期。

(18) 任碧云、王越凤:《中国流动性过剩原因辨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年第2期。

(19) 孙铮、刘凤委、李增泉:《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20) 于东智:《资本结构、债券治理与公司绩效》,《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1期。

(21) 辛宇、徐丽萍:《公司治理机制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管理世界》,2006年第5期。

counting Theory”, Englewood Cl. S. NJ: Prentice Hall.

(11) Zucca L. and D. Campbell, 1992, “A Closer Look at Discretionary Writedowns of Impairment Assets”, *Accounting Horizons*, 6(3), 30~41.

(12)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资产减值会计》,大连出版社,2005年。

(13) 戴德明、毛新述、邓瑛:《中国亏损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行为研究》,《财经研究》,2005年第7期。

(14) 王建新:《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